

相对剥夺地位与阶层认知^{*}

刘 欣

Abstract: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is marked by an ideological and factual change from egalitarianism to “let some people get rich first”. How do Chinese people perceive the emergence or the change in social inequality? How can we explain their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 review two main theoretical approaches on the emergence of class-consciousness. The first one is structural approach, the second one is dynamic approach that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relative changes in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class-consciousnes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people who experienced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economic, power, or cultural resources, are more likely to perceive the society as stratified than those who are in relatively advantaged situations. Therefore, I conclude that the second approach is better for explaining people’s perception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era urban China. A byproduct finding from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suggests that the transition to market economy may increase economic return to cadres on individual level while relatively decrease economic return to power organization on institutional level.

一、引 言

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说既是中国改革的现实经历,也是改革进程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中国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在10年文革时期,社会结构呈现出一种“非阶层化”(destratification)的趋势(Parish, 1984)。在社会结构趋于非阶层化,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人们的阶层意识是十分弱化的。即使是在1991年,在经历了近10年的改革,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了相当程度的分化之后,中国城市居民仍然认为人们之间并无阶层差别(卢汉龙,1993)。然而,中国的改革是从打破传统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开始的,不但在利益分配上,而且在观念上,都表现出一种反平均主义的倾向。随着改革的推进,人们之间社会经济地位的差距日益显著。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然还会认为社会不存在阶层分化吗?我们于1996年对武汉市754位居民的抽样调查显示,有大约77%的人认为社会是可以分层的。显然,大多数人已经有了明确的阶层认知。但是,仍有大约21%的人认为社会不可以分层。^①那么,为什么生活于同一社会的人们,对自己所处社会是否存在分层

*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吕大乐、彭玉生教授阅读了本文初稿并提出了批评意见,特此致谢。

① 调查所用的问题是“在您看来,武汉市的居民是否可以按照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分为不同的阶层?可供选择的答案是:1. 可以, 2. 不可以, 3. 不知道。”

有着不同的判断——即阶层认知呢？

对这一问题，笔者曾提出“阶层意识的相对剥夺论命题”（刘欣，2001）予以回答，认为人们在社会转型时期生活机遇的变化，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动，相对于人们所处的客观阶层地位来说，对阶层认知的差异会有更大的解释力。因为分层机制的变化使一部分人在社会经济地位上沦入相对剥夺状态，即丧失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或者未获得充分的改革新收益；而当人们沦入相对剥夺地位时，无论其占据的客观分层地位是高还是低，都会倾向于作出社会是分层的判断；反之，那些走向相对优势地位的人则会倾向于认为社会不可以分层。本文旨在对这一论题作进一步的讨论，并以中国转型期的经验资料予以检验。笔者认为，考察社会转型中人们阶层认知的差异，为探寻阶级/阶层意识产生的机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会。本文所用调查资料的搜集方法已在以往论文中说明（刘欣，2001）。

二、阶层认知发生论的两种理论取向

关于影响阶级/阶层意识产生的客观因素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基本的理论取向。^① 具有结构主义取向的“静态”模型，或“结构决定论”模型，强调人们在生产和劳作中的关系以及人们所取得的客观阶级/阶层地位对阶级/阶层意识的决定作用。比如，鲁宾孙和凯利（Robinson & Kelley, 1979）、范尼曼和帕佩尔（Vanneman & Pampel, 1977）、赖特（Wright, 1978）等人的研究都证实了人们所占居的结构性地位（如是否业主、是否居于支配性的管理地位等）对阶层意识具有解释力；豪奇和特里曼（Hodge & Treman, 1968）、杰克曼夫妇（Jackman & Jackman, 1973, 1984）等人的研究则证实了职业、教育水平、收入等个人客观地位特征对阶级/阶层意识的影响。这种理论取向所隐含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们的阶级/阶层意识是由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决定和制约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观点没有超越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论断。前面提到的那些研究者的观点，虽与马克思的观点不尽相同，但都坚持认为阶级/阶层意识是由现实社会的结构（市场机遇、工作地位等等）制约的。

与静态模型不同，“动态”模型，或“相对地位变动论”模型，则强调阶级/阶层之间社会流动和生活机遇相对变化的影响。这种观点的源头，同样是马克思对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的有关论述。马克思谈到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需求发展的同时，工人的需求却受到压抑并进而使工人产生不满情绪，他形象地写道：“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需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的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越发感到受压抑。”（马克思，1972/1849：367）很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注意到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相对地位的变动对工人的阶级心理的影响。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也表现出这种理论倾向。比如，韦伯认为，人们之间生活机遇的差别不管有多么大，其本身都不会导致有意识的阶级行动。而只有当人们之间的这种差别形成鲜明的对比时，才导致人们对阶级处境与阶级行

^① 关于阶级意识发生论的观点，并不能全部归入这两种强调客观因素的取向。与这两种观点相对的，是认为阶级意识是通过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宣传建构起来的观点，可称之为“意识形态建构论”。这里为了凸现“结构决定论”与“相对地位变动论”之间的差异，作这样的划分。

动的后果之间的理性认识,也就是阶级意识的产生(Weber, 1978: 929)。汤普森(Thompson, 1963)对英格兰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考察,可以说典型地体现了阶级和阶级意识产生的动态过程和动力机制。他将阶级视为一种历史现象,将阶级与阶级意识统一起来,纳入整个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来考察,认为阶级只有在人们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才能确定其自身的含义。阶级的产生过程就是阶级意识的产生过程,而此过程就是工人阶级的生活经历过程,就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斗争过程(Thompson, 1963: 11—12)。他写道:“阶级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形,即行动和回应,变化和冲突。不能抽象地或孤立地去定义它,只能根据它与其他阶级的关系来定义;最终,阶级的定义只能在时间的介质里去下。——阶级本身不是一种事物,它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过程(it is a happening)。”(Thompson, 1965, 转引自卢晖临, 1998)他认为,英格兰的工人阶级及其意识形成于 1790 到 1840 年间,在这个时期,虽然从统计数据来看,工人的收入有所上升,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是,在这同一时期,剥削加强了,不安加剧了(Thompson, 1963: 194, 211—212)。这是因为,工人阶级从国民产值中分享的份额,相对于有产阶级和职业者阶级来说却下降了(同上, 318)。因而,工人们会从心理上“感觉到”他们的地位和生活水平在下降(同上, 261, 381)。无疑,汤普森的论述已经涉及了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命题,尽管他关于阶级意识产生的影响因素的论述并不都是有关客观社会条件的。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论述并没有明确使用“沦入相对剥夺地位”或“相对剥夺感”这样的概念来说明问题。

笔者认为,阶级/阶层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同社会变动的剧烈程度有关。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里,阶级/阶层分化的程度也可能会相当的显著,但未必导致更明确的阶级/阶层意识;而在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中,情况就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人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化,使人们敏感于自己的得失,更有可能导致明确的阶级/阶层意识的产生。马克思在考虑阶级意识的产生时,所处的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他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不但注重“动中求静”,看到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诸要素对阶级意识产生的影响,还注重从历史发展的“动态”进程中,寻求阶级意识产生的原因。马克思所看到的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已经为后来的研究者所重视并得到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和发展。然而他有关阶级意识产生的动力机制的思想,在学术界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更没有被很好地通过经验研究加以检验。就已有的经验研究而言,基于经典社会思想家的动态理论模式的研究还很少见。本研究试图使这种思想明晰化、具体化,并以中国转型期的资料予以检验。

三、理论假设

笔者认为,人们的阶层认知,并不简单地取决于他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同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动”——用布迪厄(Bourdieu)的话来说,就是阶级/阶层流动的轨迹(trajecory)——有关。在布迪厄看来,阶级结构并非封闭的体系,在阶级结构的建构、再生产过程中,各阶级之间具有可以更替的可能性。布迪厄的阶级轨迹的概念,指的是个人和社会集团所拥有的资本量和构成比例在一定社会时空中的变化。它既指一个阶级在整个社会阶级结构变动中的向上或向下流动,也指阶级成员个体的社会流动。因此,阶级轨迹有个体的轨迹和集体的轨迹。布迪厄更重视对前一种轨迹的分析,它说明了个人的阶级惯习与阶级流动的关系。布迪厄认为,由于不同的阶级、同一个阶级内的不同成员,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发展经历,因而,哪怕是同一阶级内的成员之间,在阶级惯习上也有着各自特殊的标志

或风格。而这正是由人们的阶级轨迹的不同所导致的。一个社会集团的社会流动机会,是可以内化到人们的阶级惯习中的一种客观结构。社会集团所拥有的资本量和构成比例的变化,决定了该集团的未来,决定了其成员的态度和实践。布迪厄区分了三种可能的阶级轨迹,即向上的流动轨迹、向下的流动轨迹和摇摆不定的轨迹。向上的流动轨迹,给人们带来乐观主义的态度,使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而向下的流动轨迹,则给人带来悲观的态度,使人们对未来充满疑虑。这样一来,阶级轨迹的变化,就内化到了其成员的阶级惯习之中。外在结构的演化轨迹,变成了人们的心迹,沉淀在人们的阶级惯习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Bourdieu, 1984)。在本研究中,笔者对所使用的“沦入相对剥夺地位”、“走向相对优势地位”概念,赋予了类似布迪厄的阶级轨迹概念的含义。

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当人们与自己所处社会环境中的其他成员相比较,在经济、权力、文化等资源的占有上沦入相对剥夺地位(*relatively deprived situation*)时,无论其当下占据的客观分层地位是高还是低,都会倾向于作出社会不平等的判断。反过来看,那些正在上升到相对优势地位(*relatively advantaged situation*)的人,则更有可能做出社会是平等的判断。这就是笔者所说的“阶层认知的相对剥夺论命题”。

所谓相对剥夺地位,指的是某一个人或社会群体与同一社会的其他成员/群体相比较,所处的对价资源占有较少或不占有的状态。它不同于已有的“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概念(Stouffer et al., 1949; Merton, 1957; Runciman, 1966)。后者主要指下列情况下个人/群体的一种心理状态:当某个人/群体(1)意识到自己不具有某种资源 X, (2)意识到他人/群体具有 X, (3)期望拥有 X, (4)同时这种期望是合理的, (5)在这种状况下,个人/群体就会有“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地位是相对剥夺感得以产生的客观前提,同时,它也是促成阶层/阶级认知产生的重要条件。而相对剥夺感则可能是介于相对剥夺地位与阶层/阶级认知之间的一个中间变量。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是否正在“沦入相对剥夺地位”,可以从两个方面揭示:一是,人们是否丧失了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既得利益;二是,人们是否得到了期望得到的改革收益。倪(Nee)等人的市场转型理论,关注的是市场转型过程中经济利益分配途径的变化及其对分层机制的影响,尤其是在这种新旧分层机制并行作用的情况下,谁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进入了上层。这里的思路则恰恰相反,所关注的是谁在沦入相对剥夺地位。具体说来,我们从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年龄)、结构性地位(单位行业、单位性质)以及收入分配三个方面衡量了人们相对地位的变化。操作化后,得出了以下一组研究假设。性别则作为控制变量来考虑。

假设 1:受教育水平低的人比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更有可能认为社会是分层的

倪(Nee, 1989, 1991, 1996)的一系列研究证实了他的市场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升值的命题。教育是衡量人力资本的一个关键性的变量。随着市场机制的引进,劳动力市场不断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是决定业绩回报的重要因素(Becker, 1964)。劳动力和商品价格的确定越来越依赖市场规则和契约。受教育年限越多的人,拥有的文化资本和技术资本越多,其劳动业绩也越大,因而获得的经济回报也越大,在获得新的改革收益上,处于优势地位;在维护既得利益上,也会处于相对优势地位。这也就是说,越是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沦入相对剥夺地位的机会就越少,因而他们越倾向于认为社会并没有分层。相反,越是受教育水平低的人,则越有可能沦入相对剥夺地位,越有可能感觉到社会是分层的。

假设 2:工人,尤其是非技术工人,比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更有可能认为社会是分层的

我们将职业分为非技术工人、技术工人、职员/办事员、党政企事业单位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五

类。改革之前,知识分子与干部和工人老大哥相比较,尤其与干部相比较,在收入、福利待遇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Walder, 1995)。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专业技术人员有可能凭借其优越的人力资本,在既得利益的维持和改革新收益的分配上,处于优势地位。相形之下,工人,尤其是非技术工人,因拥有的技术资本量少而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更有可能处于相对剥夺地位。因此,工人,尤其是非技术工人,比专业技术人员更有可能认为社会存在着不平等的分层。职员/办事人员,是近年来成长比较快的一个职业群体,他们是介于领导干部—工人、专业技术人员—非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一批工薪人员。在社会经济利益重组的过程中,总的说来,他们是一个“就高不就低”的利益群体。在维护既得利益和获取新的利益“好处”上,都可以靠着领导沾光,或跟着专业技术人员“搭车”。他们的地位处境,更接近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而与工人的差别会比较显著,处于比工人相对优越的地位,因此不会比工人更倾向于认为社会是不平等的。

假设3:年长者比年轻者更有可能认为社会是分层的

在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各种报酬的分配有论资排辈的倾向(Davis-Friedmann, 1985)。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在福利分配上偏向老年人的倾向,都一直明显存在(Walder, 1990, 1995; 戴慧思, 2000)。这是因为经济和其他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机制依然起支配作用。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比重不断增大,论资排辈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边燕杰和罗根(Bian & Logan, 1996)的研究表明,在市场作用日益重要的情况下,年龄对收入回报的影响呈递减趋势。这样一来,在改革新收益的很多方面,年轻人处于优势地位,而年长者则逐渐沦入相对剥夺地位。因此,年长者更有可能认为社会是分层的。

假设4:国有、集体企业的职工比其他性质的单位的职工,尤其与三资、私营、个体企业的职工相比较,更有可能认为社会是分层的

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国有企业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支柱,而国有企业的职工,因有了国企“铁饭碗”而享有比集体企业更多的收入、福利、权力和声望。作为工人阶级主体的全民企业职工,是企业的主人,是领导阶级。集体企业在传统体制下,虽地位不如全民企业,但在很多方面也都参照全民企业的做法,为职工谋取福利。改革以来,随着企业自主权的不断扩大和工资、劳动人事、住房、公费医疗等制度的改革,国有企业职工的铁饭碗被打破了,原本可以从制度安排中得到的资源保障受到了冲击,工人从“主人”的地位,降到了劳动合同制下的“受聘”地位。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职工的优越地位丧失殆尽。相形之下,三资企业则在市场经济转型中大获其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三资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就高出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50—60%,比城镇集体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高1倍。私营业主的收入要高出一般职工10倍以上(李培林主编, 1995: 11)。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总体来说,无论在既得利益的维护还是改革新收益的获取上,都在沦入相对剥夺地位,因而更有可能认为社会是分层的。

假设5:经济效益较好的金融、电信、保险、房地产、交通行业的职工,较其他行业的职工更倾向于认为社会不可以分层。

这里将行业分为五大类,即(1)工业制造业,(2)商业服务业,(3)金融、电信、保险、房地产和交通业,(4)科教文卫等行业,(5)党政社团。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时期,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使得制造和物质生产部门的工资有明显的优势。像武汉这样一个重要工业城市,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经济地位在全国大城市中都名列前茅。改革后,金融、电信、保险、服务业职工的经济收入迅速上升,而工业制造等行业职工的经济地位则明显下降。1994年时,

国民经济 16 大行业中,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收入行业职工之间平均收入的差距达 1.98 倍。平均工资水平较高的行业是金融、房地产业,较低的是制造和采掘业(李培林主编,1995:11)。显然,经济效益较好的行业的职工正在走向相对优势地位,因而会倾向于认为社会是不可以分层的。

假设 6: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更有可能认为社会是分层的

收入是衡量人们经济阶层地位的核心指标,综合地反映着人们在社会转型中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和获得改革新收益的状况。许多学者在研究苏东及中国的市场转型对分层机制变化的影响时,都以收入作为主要因变量(Cao & Nee, 2000)。在社会转型中,低收入者更有可能是那些沦入相对剥夺地位的人,而高收入者则相反,更有可能是走向相对优势地位的人。因此,两者的阶层认知也会表现出相反的倾向:前者比后者更有可能认为社会是分层的。为了使变量之间的关系更符合线性模型的要求,在统计模型中使用了年收入水平(组中值)的自然对数。

四、研究结果

下表给出了两个统计模型。考虑到职业与教育这两个变量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可能会影响整个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定性,我将这两个变量分别引入模型。模型 1 剔除了教育变量,保留了职业变量;模型 2 则剔除了职业变量,保留了教育变量。与零假设模型相比较,模型 1 所解释的 G^2 为 61.100,相应的自由度为 16;模型 2 所解释的 G^2 为 56.529,相应的自由度为 13。两个模型均具有高度的显著性($p < 0.000$)。

从反映人力资本的几个指标来看,年长者比年轻者更有可能认为社会是分层的;受教育年限与阶层认知之间呈现负相关,教育水平越高,越有可能认为社会不可以分层,而教育程度越低,越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可以分层的;与专业技术人员相比较,工人(包括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更有可能认为社会是分层的,而党政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职员与专业人员之间并无显著的差别,他们都比工人更有可能认为社会是不可以分层的。有关结构性因素的两个变量中,单位性质对阶层认知的影响是显著的。与私营、个体企业相比较,党政机关、全民企业、集体企业都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其中以集体企业的差异最为显著,也就是说,一旦研究对象为上述性质的单位的员工,就比私营、个体企业的员工有更大的可能性认为社会是分层的;而事业、三资企业的员工之间则未显示出这样的差异。不同行业之间的员工的阶层认知没有显著性差异,这可能与我们将金融、电信、保险、房地产和交通业归并为一类,并把它作为比较项有关。因为交通与金融等行业之间在经济、社会资源的获取上可能有较大的差异,同时,交通行业的内部差别也很大,三轮车夫和民航小姐同被划分到了交通行业。因此,有可能是统计分组的不合理导致了模型中行业变量之间无显著差异的结果。对理论假设,有待用更合理的分组资料再作检验。收入变量的影响具有高度的显著性,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更有可能认为社会是分层的。控制变量性别没有显著性。比较两个模型的 G^2 还可以发现,职业所解释的阶层认知的差异,比教育所解释的要稍微大一些。

总的看来,统计结果除了不支持关于行业的假设(假设 5)外,支持其余所有的假设,表明“阶层认知的相对剥夺论命题”是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释中国社会转型中人们阶层认知的差异的。无论是从拥有的人力资本方面来看,还是从占据的结构性地位来看,那些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沦入相对剥夺地位的人,都比走向相对优势地位的人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是

分层的。

阶层认知对各自变量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自变量	模型 I		模型 II	
	参数 B	Exp(B)	参数 B	Exp(B)
性别(男性)	-0.025 (0.202)	0.976	0.038 (0.201)	1.039
年龄(岁)	0.029 * * (0.009)	1.029	0.020 * (0.009)	1.021
教育水平 (年)	——	——	-0.104 * (0.041)	0.901
职业 a				
非技术工人	0.910 * * (0.329)	2.484	——	——
技术工人	0.878 * * (0.318)	2.406	——	——
职员/办事人员	0.367 (0.318)	1.444	——	——
党政企事业干部	0.294 (0.305)	1.341	——	——
年收入水平 (ln(元/年))	-0.582 * * (0.212)	0.559	-0.579 * * (0.214)	0.560
单位性质 b				
党政机关	1.424 * (0.620)	4.155	1.293 * (0.600)	3.643
事业单位	0.505 (0.474)	1.657	0.368 (0.459)	1.445
全民企业	0.899 * (0.383)	2.458	0.820 * (0.372)	2.270
集体企业	1.721 * * (0.558)	5.593	1.500 * * (0.539)	4.482
三资企业	1.159 (0.630)	3.188	1.017 (0.612)	2.764
单位行业 c				
工业生产	0.247 (0.327)	1.280 (0.322)	0.258	1.295
商业服务	0.292 (0.369)	1.339	0.343 (0.360)	1.409
教科文卫	0.279 (0.381)	1.322	0.200 (0.371)	1.221
党政社团	-0.289 (0.473)	0.749	-0.324 (0.465)	0.723
常数项	3.787 * (1.874)	44.106	5.947 * * (1.818)	382.532
-2LL	697.025		701.534	
个案数 N	726		726	

注:可以分层为 1, 不可以分层为 0; a 专业技术人员为参照项, b 私营个体企业为参照项, c 金融、电信、保险等行业为参照项;
* P<0.05, * * P<0.01。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党政企事业干部”这一虚拟变量不显著,也就是说,党政企事业干

部倾向于持社会不可以分层的看法；但是，单位性质为“党政机关”这一虚拟变量时，却是显著的，也就是说党政机关的员工却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可以分层的。这两个结论矛盾吗？这一结论究竟是支持倪的市场转型中权力资源贬值而人力资本升值的结论，还是支持边燕杰等人(Bian & Logan, 1996; Rona-Tas, 1994; Zhou, et al, 1996)的与之相左的结论呢？

笔者认为，将这两点结论结合起来看，不仅不矛盾，还有有价值的新发现。首先得注意到这两个变量指涉的对象并不相同，党政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并非都在党政机关，而党政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也并非都是领导干部。其次，得看到这两个变量在模型中是互为控制变量的，也就是说，在同为领导干部职业的情况下，一旦在党政机关，就会比在事业、三资、私营、个体企业更有可能处于相对剥夺地位（因统计模型中事业单位、三资企业与参照项私营、个体企业之间的差异不显著）。显然，从权力机构的组织层次上来看，这一结论与倪(Nee)的政治权力贬值命题并不矛盾。三资、私营、个体的员工在市场机遇中有其优势，而事业单位的员工则有可能凭借其相对优越的文化技术资本而在新的改革收益中获得相对优越的地位。再次，在控制单位性质变量的条件下，考察职业变量我们会发现，党政企事业单位的干部与专业技术人员相比，在阶层认知上，并没有表现出差异，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像工人那样，处于显著的相对剥夺地位。表明领导干部既可能维护了既得利益，又可能获得了新的改革收益。这点又同“权力继续论”观点一致。这样一来，我们的结论不是自相矛盾了吗？回答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应当把“市场转型理论”和“权力继续论”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看问题。笔者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市场转型中权力的经济回报，在党政干部“个人层次上升值”，而在党政机构“组织层次上贬值”。对这一发现的进一步概念化和检验，笔者会在另一篇论文中作具体的探讨。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从经典社会思想家的有关论述，尤其是马克思的论述中，引伸出阶层认知产生机制的“动态”理论模型，并使之明晰化、具体化，提出了“阶层认知的相对剥夺论命题”。这一命题从中国转型期的资料中得到了较有力的支持。

回到第一部分提到的阶层认识发生论的两种理论模型来看，注重“静态”结构分析的理论者们也许会认为表中的统计结果是支持他们的理论的。他们可能会提出假设，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比较高者更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分层的。确实，在个人层次的变量上，即年龄、教育水平、职业、收入这些变量上，他们的假设是成立的；但是，他们的理论却无法解释单位性质这一结构性变量为党政机关时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一结果。

此外，那种认为阶级/阶层意识是通过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宣传建构起来的观点，也难以解释本文统计模型中的一些结果。比如，受教育年限越少者，越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分层的，而越高者越有可能认为社会是不可以分层的。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无疑会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传媒以及其他各种信息和知识资源。关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分配不公”、“脑体倒挂”等现象的揭示和舆论，可以看作是公共生活领域对社会分层结构的“建构”和“定义”。如果人们的阶级/阶层意识的产生主要取决于知识分子的建构和宣传的话，那么，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会有更多机会接触传媒以及其他知识和信息资源，就会更有可能认为社会是分层的。而本文展示的统计结果，却恰恰与之相反。

因而，笔者认为，阶级/阶层意识产生机制的动态理论模型，更具体地说，阶层认知的相对

剥夺论命题,与上面提到的其他两种理论模式相比较,在拟合中国转型期的经验资料上更为适当,是更为有效的理论模式。但这并不是说笔者所提出的这一命题已经得到了充分严格的经验检验。由于资料的限制,本文只使用了一个时点的资料检验假设。若使用不同时点的资料,或者在自变量中使用被调查者历时性的资料,比如,三年或五年来的收入变化(将两个时点的收入标准化以后作比较),被调查者对自己生活质量变化的评价等等,则会使研究结论获得更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这样做,也将使我们能够进一步弄清楚人们的阶级/阶层地位与其地位相对变化的状况,对阶级/阶层认知的产生、发展来说,哪个更重要;对笔者所概括的“结构决定论”模式和“相对地位变动论”模式的适用性,也可以作出更为有效的评价。

至于本文所概括的“市场转型中,权力对获得经济回报来说,在党政干部‘个人层次上升值’,而在党政机构‘组织层次上贬值’”的结论,笔者认为,对这一结论的进一步探索,会有助于认识中国社会转型期分层机制的变化。

参考文献:

戴慧思,2000《20世纪90年代的不平等和分层》,《国外社会学》第5期。

李培林主编,1995《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

刘欣,1993《阶级地位与市场机遇:韦伯的阶级理论》,《社会科学研究》第5期。

——,2001.《转型期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社会学研究》第3期。

卢汉龙,1993《社会地位观:中国市民如何看待自己的地位》,天津“国际社会学研究方法研讨会”,8月24—26日。

卢晖临,1998《社会学转向历史的背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编《社会研究》第6期。

马克思,1972/1849,《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Becker, Gary S. 1964,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ian, Yanjie & John R. Logan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1.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o, Yang & Victor Nee 2000, “Comment: Controversies and Evidence in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5.

Davis-Friedmann, Deborah 1985, “Intergenerational Inequalitie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Vol. 11.

Hodge, Robert W. & Donald J. Treman 1968, “Class Identif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3.

Jackman, Mary R. & Robert Jackman 1973,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8.

Jackman, Mary R. & Robert Jackman 1984, *Class Aware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erton, Robert K. 1957,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Nee, Victor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4.

———1991,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6.

———1996 “The Emergency of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 Panish, William L. 1984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ed. by J. Wat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binson, Robert V. & Jonathan Kelley 1979 "Class as Conceived by Marx and Dahrendorf: Effects on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4.
- Rona-Tas Akos 1994 "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0.
- Runciman, R. G. 1966,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A study of attitudes to so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 century Brita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 1965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in *The Socialist Register*, ed. by R. Miliband, London: Merlin Press.
- Vanneman, Reeve & Fred C. Pampel 1977, "The American Perception of Class and Statu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2.
- Stouffer, Samuel A., Edward A. Suchman, Leland C. Devinney, Shieley A. Star & Robin M. William 1949, *The American Soldier: Adjustment during army life*, Vol. 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alder, Andrew 1990 "Economic Reform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ianjin, 1976—1986." in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ananmen: The impact of reform*, ed. by D. Davis & E. F. Voge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5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0.
-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right, Erik Olin 1978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 1997,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hou, Xueguang, Nancy Brandon Tuma & Phyllis Moen 1996 "Stratification Dynamics under State Socialism: The Case of Urban China, 1949—1993." *Social Forces*, Vol. 74.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宛丽